

共性与特性：近世以来文化承继与区域经济变迁

荣晓峰

近世以来的中国区域经济变迁呈现出共性与特性并存的二元格局，既具有适应不同区域发展的普遍规律，又表现出鲜明的区域特色。由此，学界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上对于不同区域的共性和微观层面上对于部分区域的特性进行研究。随着经济史学研究的深入，共性与特性问题的争论日益凸显。有鉴于此，“共性与特性：近世以来文化承继与区域经济变迁”学术研讨会于2017年9月23日至24日在山西晋中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经济史学会、《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山西大学晋商研究所、山西省晋商学与区域经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山西省晋商文化研究会等单位主办。来自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南开大学、南京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单位的15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并进行了主题报告和分组讨论，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

制度变迁对于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是无可争议的，不同经济的长期绩效差异从根本上受制度演化方式的影响，学者们围绕制度变迁对于经济的推动展开讨论。杨德才以张謇创立的“南通模式”为例，指出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张謇在近代南通建立了一种区域性一体化制度体系，实现了在国家主体制度难以变迁条件下区域性制度的突破性发展，从而促进了近代南通地区经济大发展。许檀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考察清代中叶晋商在济南的经营特色，指出济南的晋商字号并不算多，但经营特色却十分明显，除金融和盐业之外，首饰业和药业占比较高，这种行业选择是晋商为适应济南高端消费群体相对庞大而采取的策略。燕红忠指出山西票号集汇兑和存放款于一体，为商业贸易提供了信用和债务清算体系，极大地推动了区域之间的贸易发展和市场融合，并将传统金融和商业信用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和发展阶段。林枫指出清代恰克图贸易直接联系了晋商与闽茶，闽北茶区是晋商采购茶叶的重要基地，其茶业经历了从飞速发展到逐渐衰落的过程，而传统经济结构和经济关系也随之而改变。刘秋根、张建鹏指出晋商的《立账簿头绪》是我国第一部民间会计著作，其损益核算符合权责发生制原则，相应的报告显示向龙门账会计报告过渡的趋势，为我国复式记账的起源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参考。史若民从近世中外社会演变的视角探讨晋商股份制对社会进步的积极意义，指出晋商股份制比欧洲股份制早出两个多世纪，具有一定先进性，而这种良性循环发展的制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是一致的。张百顺以民国时期维持直隶省钞案为中心，探讨商人组织与政府在平息金融风潮、恢复货币信用中的不同作用以及相互的利益博弈。张桂萍指出票号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治理结构框架下，以人力顶股制度为主线，明确不同利益相关者权利和责任的制度性安排，是组织关系一体化、票号资本股份化、资本运转市场化的创新。薛秀艳通过回顾晋商兴替的历史轨迹，指出晋商不应被视为一个同质的、同源的、无差异的概念，而应将其还原到一个区域历史发展的时间脉络和历史传统中重新审视。

部分学者通过史料挖掘，探讨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关永强考察了北洋政府创办的经济讨论处关于近代山西经济和晋商的调查报告，梳理了其中关于山西煤矿、铁矿、磺矿、林业、蚕桑、禽畜、农佃制度、工业、劳工以及晋商、票号的调查情况。郭娟娟围绕大盛魁投资电气工业史

[作者简介] 荣晓峰，山西大学晋商研究所讲师，太原，030006，邮箱：rongxf@163.com。

料,以民国时期归绥、包头两地为考察中心,梳理和探讨了近代旅蒙晋商为实现商业到工业的转型所做的努力及其转型困局。徐俊嵩通过考察晋皖两省的方志、谱牒和碑刻资料,发现晋商在安徽的分布呈自北向南递减的趋势,这既与国家制度的调整有关,又源于两大商帮基于自身资源禀赋、商品产地及销售市场等因素的博弈。陈文慧指出山西书院的发商生息与其自身的发展历史轨迹相一致,主要分布在文教发达且经济繁荣的晋中、晋南和晋东南地区,其管理模式有官府经管和绅营官督两种。贾瑞考察了万里茶路南部路线,指出茶路由于政治原因进行过些许改变,使得晋商运往恰克图的茶叶运期更短,茶叶质量也能够得到保证。

二、文化伦理与商业文明

以晋商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商帮塑造了中国的商业文明,并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商业伦理。高春平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为起点,指出开放精神贯穿晋商经营,创新精神是晋商兴盛之动力,这对于山西转型发展和新晋商开拓创新具有重要启示。曾江、周建波以文化特征与伦理现象为线索,对晋商经济伦理的来源与构成进行宏观视角的梳理,指出晋商经济伦理根植于深受儒、释、道三家文化影响的山西社会,是文化思想在商业与金融领域的集中体现。常忠义指出商业伦理对于义利之间的纠葛,是考验各个商家字号在同样的外部环境之下长久与否的试金石。范浩里认为必须在更大范围推动晋商制度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和发展,以晋商文化的时代传承与转型推动当代企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梁四宝从晋商的经营管理制度及金融商贸活动、晋徽商比较、文艺作品、国外相关研究等方面梳理了从清朝光绪年间至今的晋商研究成果。张延华分析了晋商之祖猗顿对后世晋商的影响,认为猗顿所倡导的“诚信”和“义气”成为晋商立业处世所遵循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

三、产业史研究及其他

与会学者还就产业史以及其他方面展开讨论。马陵合分析近代中国铁路史发展,指出以行政区域为范围研究铁路发展历程,既要显示地方史研究中所必要的空间定位,也必须充分考虑中央与各級地方政府在铁路问题上的互动关系。张晓玲认为抗战时期晋绥根据地煤矿业经济增长属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成功实践,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梁娜以山西棉花打包机厂筹建为例,详细梳理了在引进技术设备过程中,企业自主经营权的变化对技术引进的影响,从微观视角考察了20世纪30年代工业化进程中的经验得失。李欢认为在民国教育近代化变革中,山西省政府以财政大力支持教育,对个人和社会都产生了溢出效应,间接增加了家庭收入,并改善了社会学术、技术和人才环境。

开幕式上,中国经济史学会秘书长隋福民研究员代表中国经济史学会致辞,对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祝贺。会议期间,正值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成立10周年之际,中国经济史学会、《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南开大学经济史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史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辽宁大学比较经济史研究中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史研究中心、河南大学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山西社科院历史所、山西社科院晋商文化研究中心等单位以贺电、贺信等形式表示祝贺,对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在学科发展、人才培养、服务社会等方面取得的成绩表示赞许,也真诚期望与研究所继续加强交流与合作,为我国的经济史研究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责任编辑:丰若非)